

■人物素描

李稻葵“大国战略”揭开中国发展新思维

□张量

“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实行大国战略。如果继续推进小国的、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国家可能面临出口额愈高、经济效率愈低的局面。”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稻葵教授,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战略根源提出了这样的大胆思考命题。在他看来,“大国战略”是一种既有益中国,又助推世界经济的更开阔的思路。

从清华到哈佛

1964年出生的在北京的李稻葵,因幼年随在外交部工作的父母下放到湖南、江西等地五七干校的那段动荡生活而练就了极强的适应能力。直到不愿再虚度时光的父亲在干校同事们都在苦苦等待回北京时所做的那个引起震动的决定——去四川大学继续从事印度研究,李稻葵随父去了成都,童年生活才算安定下来。1980年,年仅16岁的李稻葵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经济系。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复建后的清华经济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第一屆本科生中,李稻葵是最用功的一个。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机遇降临到他的面前。时值“邹庄经济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考试,成绩列全国第二名,被邹教授推荐申请哈佛的留学资格。但由于是第一年,一切手续都拖得较晚,以至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而此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帕金斯恰好来北京,他很欣赏李稻葵,便安排他先做哈佛访问学者,次年再推荐他入学。

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进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他于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李稻葵在哈佛时的留学同窗,茅于軾、樊纲、胡祖六、钱颖一、白重恩等,现在大都已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或新锐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洋学者,有着强烈的改革参与意识,浓厚的“改革情结”影响着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选择,李稻葵算是其中的典型。

从哈佛毕业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金融系和密歇根大学的经济系同时向李稻葵发出了助理教授的邀请。金融系的工资比经济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纽约大学的金融系水平不错,当时自称全美排名第四,而它的

■慕尼黑漫笔

搬弄“哈耶克”,会砸到谁脚趾

□梁雨霏 (德国)

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等一串德文名字,相继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影响过中国。有的似乎渐渐地被淡忘,有的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提起。

经济学服务于经济社会,就像医生治病,不同的经济疾患需要不同的药方,假如生搬硬套别人的处方,就很危险。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他主张,由市场自发地形成价格秩序,政府可以维持法治,管管道路和环境污染什么的。而最近刚刚去世的弥尔顿·弗里德曼也主张尽可能地限制政府职能,以保障社会和经济秩序。

解读哈耶克,他的思想大致是:政府怎么知道张三李四的需求呢?又怎么能为一个具体的东西制定合理的价格呢?市场当然比政府更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做什么。所以,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发形成某种秩序。当然,完全放任市场自由,有些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有所欲为,比如不顾环境,或者弄虚作假,所以需要加强道德约束和法制监督。

这听起来很圆满。哈耶克是大师,大师的话对不对呢?我要用西方战略学家最钟爱的一句话来回答: It depends! 是的,要看情况,不能因为人家的话有道理就闭着眼睛乱用。

哈耶克的理论问世于二战的烽火中,适用于战后的废墟重建,是否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开始探讨大国发展战略,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我们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走弯路。”——李稻葵

隔壁就是华尔街。但为了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经济学研究,李稻葵最终选择到密歇根大学的经济系任教,同时兼任该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7年,李稻葵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年,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研究空间,李稻葵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选择了能更近距离观察中国发展的香港科技大学。这时,他的研究与母校清华大学连接在了一起,2002年,清华大学将他作为“特聘教授”请回母校。经过两年的磨合,如今李稻葵利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假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全职工作,并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把中国改革实践升华为理论

李稻葵的学术之路一直与他心中的大命题“中国的发展”紧密相依。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稻葵就开始重点研究国企,提出了既非“管理派”又非“产权派”的主张——深入所有制和产权的改革,并由此引发与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论战,成为经济界一时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并不能截然地用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乡镇企业,产权不明晰却收效甚大。因此,李稻葵曾提出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主张在改革中采取有合理性的次优安排,从而逐步推进改革的深化。李稻葵认为,应当把政府行为纳入研究视野,只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推动改革进程,这也是他研究的独特之处。他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变迁对一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和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在胡佛研究所期间,李稻葵看

到中国政府官员行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以往以个人政治生涯为目标转变为通过地区发展显示个人政治能力的模式,由打击组织经济发展转为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巨大的变化令李稻葵热血沸腾: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十余年,却始终只能徘徊于边缘学科,而且“美国如何因应中国兴起”的研究目标与自己出国留学的初衷可谓南辕北辙。终于,他走上了回归的道路。

回国后的李稻葵又进一步调整了研究思路。他很肯定地说,“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回来,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为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同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李稻葵说,“我的研究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大国战略五点思考

目前,李稻葵将主要精力放在关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跨国经济制度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经济的大国发展战略问题上。他的“大国战略”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李稻葵认为,从实际经济活动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中国还是极度开放的经济体,这样的国家必须对经济发展有深刻的思考。然而,虽然有很多改革

经验,但中国发展战略思维却很落后。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出奇地高;中国的核心生产技术依赖外国企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界自然资源;中国经济的贸易比价日趋向对中国不利。以至于中国经济目前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即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就下降,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就飙升。

如何挣脱这个困境呢?李稻葵的答案是,中国发展战略需要新思维,即“大国战略”。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对外关系的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受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左右,即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国际间劳动分工的效率,使之为国家经济服务。但李稻葵认为,这个理论已远远不适应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在世界经济史中,从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从非常落后的状况直追发达国家的先例。而大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贸易比价对大国本身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的。所以,一个大国一味追求比较优势,势必使它陷入以上所述生产什么什么就不值钱、不生产什么什么就值钱的尴尬局面。因此,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即要实行大国战略。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李稻葵列了这么五条:一,建立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提高内需;二,在重要体制上要有制度创新,如土地制度、外汇等;三,要在重大技术上有突破,如能源、农业技术等;四,要有灵活创新的政策新思维;五,要有大国外交意识,合理利用国际经济的各种规则,并在WTO的框架下,发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桥梁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他还特别强调,大国战略的一

个重要部分就是要谨慎处理国际金融的挑战,尤其需要注意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维持一定的升值压力,树立信任度,再逐步开放。

只有中国能提出独特经济命题

在回清华任教之初,李稻葵就曾明确表示不干预行政,因为他认为自己回国的意义在于走出一条学术新路。他眼中的这条新路的前景是:“全世界经济学家大都跟在美欧等国的思路后面走,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从美欧自身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问题。现在只有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只有我们才可能提出独特的经济命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有影响,有贡献。长期坚持必将有收获!”

这位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交谈中坦率真诚的年轻学者,怀着对学术的无比热情,但却声称最盼望退休,因为那时他才可以尽情去做他感兴趣的事。然而,李稻葵的兴趣又是那么的广泛:音乐、戏剧、体育,还有修汽车。少年时就随父亲去看京剧、话剧,留学时常常跑去看篮球赛、听音乐会,现在每周还要和大学时代的体育老师赛打篮球。

如果说对艺术的爱好是来自家传,那么对于体育的钟情和从修汽车中自得其乐,则透露了他生命中清华岁月的清晰烙印。热爱生命与运动、理性思维与动手能力超强是典型清华学子的特征。李稻葵正是这样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修车高手,能和从修汽车中琢磨出哲理的人,但他却自认是个很不像工科生的人,他喜欢与不同行业背景的人聊天,善于从中学习借鉴。他欣赏兼容并蓄精神,已将之注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

这不,李稻葵现在开始研读起古代汉语了。原来,他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学富矿,他一直希望将现代经济学研究与中国古代的经济史结合起来。

■本期人物话语



今年做好非公经济准入工作

马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日前在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联席会上说,今年是“非公经济36条”出台的第三年,但现在尚有12项配套文件没有出台,力争年底前全部出台,同时要在今年把各个领域市场准入工作做好,做到“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多声道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着力建设四个基本制度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 3月22日在海南出席中国(海口)国际医药高峰论坛时表示,当前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即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品管理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

攀比影响统计数据真实性

卜新民(广东省统计局局长) 3月12日在2007年广州市统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在统计数据方面,目前一些地区还或多或少存在攀比现象,这影响了统计的科学性、客观性。而且目前的统计更注重好的方面,一味赞扬,统计应该更考虑民生需要,比如房价、环保等。

拉动消费关键在农民工增收

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经济教授) 在3月17至18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我很难相信过去十五年,非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大幅提高,如果有上涨的话,我想工资上涨的是那些正规就业的人,他们是全职的工作人员,有正式的劳动关系,他们的工资肯定上涨,这些人有技术,是白领或者蓝领。政府应该特别重视那些还没有签订固定劳动

合同的打工者,他们的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更能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真实情况。增加他们的收入,对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十分关键。

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马德伦(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在河南省鹤壁市出席全国春季农业工作会议时表示,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重点是改进金融服务方式、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从整体框架看,各类机构之间的互补竞争、金融服务方式的改进、财政资金的调节作用以及农村资金回流农村,四者缺一不可,且相互依存,共同作用,相辅相成。首先,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小额贷款组织要改进金融服务方式,通过产品创新和工具创新,提供符合“三农”需求的金融服务。彼此之间要展开适度有益的竞争,实行交叉分工、合理定位,提供不同风险偏好的产品差别化服务;其次,在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的发展格局下,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财政,需要财政杠杆撬动金融资源,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资金是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动力和源泉,必须高度重视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要保证农村资金用于“三农”,防止农村资金外流,这是农业人口有效并入工业部门的重要手段。

■经济学思潮追踪

代际传递概念 剖析长期贫困症结

□梁怡

贫困问题作为一项困扰全人类的世界性难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众多研究,在认识贫困的实质、特征、类型等理论含义和思想框架方面,以及研究贫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过去,大多数有关贫困的研究都集中于导致贫困的原因及逐年测量贫困的总体水平,而很少注意贫困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人们随着时间而摆脱(并且经常返回)贫困的轨道。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贫困的成因源自收入差别,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的经济选择理论可以解释贫困的成因。而对于一些最贫困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那里因缺乏可利用资源而导致的公共或私人投资缺乏以及人均公共支出的低水平,是贫困群体处于长时间的、严重的贫困的主要原因。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贫困研究领域新兴起的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问题研究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所谓“长期贫困”,可以定义为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能力剥夺,其中“个体”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贫困研究除了延续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外,还特别强调贫困的持久性(duration of poverty)、动态性(dynamics of poverty)、多元性(multi-dimensional-ness)、代际传递性(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和严重性(severity of poverty)。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当前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宏观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应该着重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再并之传递给后代这样的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看成是长期贫困最具实质性的界定;它不但可以被看作是长期贫困的特征,还可以被看作是造成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由社会学的“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研究范式中发展而来,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它可能受个人的天赋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

美国经济学家们的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可以分解成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容和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容,大部分文献强调的是人力资本——特别是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健康和营养等几方面的问题。

剖析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原因,较有影响的观点有如下五种:要素短缺论,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提出。他断言贫困的原因在于要素的短缺;他所说的要素主要是指资本、资源、科学技术等脱贫致富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经济学家倾向于从经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贫困性,认为贫困是贫困者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有效配置的结果。要素短缺论虽有一定解释力,但忽视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贫困文化论,根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等人的观点,穷人已形成贫困文化。他们认为,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贫困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他们将贫困完全归因于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忽视了造成贫困的社会结构力量的持续影响。

功能贫困论,认为贫困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需要。这一理论的著名代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说,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或者是因为他们天赋较低,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为接受较高的教育而付出代价,因而只能担当较低的工作职位,低职位决定低工资,低工资导致贫困状态;而贫困自身的存在对整个社会也会有积极作用,发挥着有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并有助于保持社会效率。

社会排斥论,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但是,社会排斥只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排斥、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对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和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

能力贫困论,此说以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为代表。森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他主张,应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同时,他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但他忽略了客观的机会——穷人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